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劉曉波：作為我們的問題—重讀《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

Liu Xiao Bo as Our Problem: Re-reading From Tian-An-Men Incident to "Charter 08"

doi:10.6752/JCS.201006_(11).0014

文化研究, (11), 2010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1), 2010

作者/Author：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陳徵宗(Jhang-Zong Chen)

頁數/Page：218-23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14](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6_(11).001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劉曉波：作為我們的問題 ——重讀《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

Liu Xiao Bo as Our Problem:
Re-reading *From Tian-An-Men Incident to "Charter 08"*

子安宣邦

KOYASU Nobukuni

陳徵宗 翻譯

Jhang-Zong Chen

六四問題將如何獲得解決，這直接關係到中國能否和平地轉變為民主國家這一巨大公共利益。

——劉曉波，〈「轉型期的正義」：改革無須暴力革命〉

一、劉曉波問題與日本媒體

劉曉波這個名字我知之並不甚早。在2008年12月9日發表的所謂「08憲章」的報導中我才知道他。我現在雖然稱之為「報導」，但這並非根據大眾傳媒的報導。的確，我是經由NHK的新聞報導才知道

* 劉曉波著，劉燕子編，子安宣邦序，劉燕子、橫澤泰夫、及川淳子、蔣海波翻譯，《天安門事件から「08憲章」へ：中国民主化のための闘いと希望》（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中國民主化的奮鬥與希望）（東京：藤原書店，2009）。

「08憲章」。然而，想要知道其詳細情形、追蹤其後續的電視或報紙的新聞報導，卻是無功而返。電視、新聞等都無其詳細情況的報導。我只好用電子郵件詢問旅居日本的中國朋友。很快地，從劉燕子女士¹處得知這件事情的首尾，以及網路上關於「08憲章」與許多相關資訊的消息。如是，我又同時得知了「08憲章」的日譯版以及參與起草的劉曉波在2008年12月8日那天被收押的事情。我之所以知道劉曉波的名字是由於這樣的緣故。

然而劉曉波是何許人？我再度在網路上搜尋他的資訊。回答我這些問題的乃是刊載於集廣舍的網站²上極好的報導。那是「中國知識人群像」的第一篇——介紹劉曉波的文章。因此，我才終於得以掌握劉曉波這一人物的輪廓。然而我之所以如此陳述知道劉曉波此人的過程，乃是因為，這與我至今為止所了解的其人其事的過程大不相同。我並非經由當下的媒體，而是透過網際網路得知「08憲章」與劉曉波。我把如此得來的資訊，透過我的網站傳遞開來。

在網路上發表的「08憲章」，要求將中國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改革為民主體制，其支持署名一樣在網路上匯集。雖然當局加以限制、刪消等干涉，以本名署名的支持仍然持續增加。該憲章主張批評政府體制乃是自己的權利的運動型態，這是新聞、傳媒等大衆傳播媒體作為官方許可體制的中國社會才有的。劉曉波在陳述中國的未來在民間之時，被視為最有力的民間力量，同時也是透過網際網路的民間自立性的聲音的聯合，以及批判性民意的形成³。但是我在此所要提出的問題是，沒有言論控制的日本的資訊傳達實況。日本的大衆傳媒，除了一些持續進行反中國的負面新聞的媒體之外，在正面性的、關懷的

-
- 1 我在文中使用中文專有名詞，是出於對劉燕子女士為劉曉波等人奔走不懈的敬意。下文提到的及川淳子女士亦然。編按：本文中譯後，原「日文中文」及「中文專有名詞」間的區別便消失了，保留此註腳以代表本文作者對所提及幾位人士的敬意。
 - 2 集廣舍出版的珍貴書籍讓我們知道了從既有的媒體上難以得知的中國實情與問題。集廣舍：<http://www.shukousha.com/>。
 - 3 劉曉波，〈一人一句真實，擊垮獨裁權力〉，《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

報導之中，可以說幾乎看不到「08憲章」與劉曉波。在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前，在大眾傳媒的報導中可以發現劉曉波的名字的，只有那些用心的追蹤關懷者而已吧。我也只能夠透過網際網路，來收集關於劉曉波或是「08憲章」的資訊。

這種情況不禁使我思考，理應擁有自由言論報導權的日本當下的新聞報導機關的報導實況。我在「思考天安門事件與08憲章」的緊急集會發言問道：「關於現代中國的政治問題的報導，是否有『自我約束』這一回事？」⁴參加此集會的《朝日新聞》記者回答說：「報社內並沒有這樣的約束」。或許正如這位記者所言，「自我約束」這樣的約束並不存在。然而若是某新聞報導對於可能導致中日關係緊張、引起反日遊行的中國問題等帶著高度顧慮，這也是合情合理的。我認為就是因為這樣的顧慮，使得「08憲章」與劉曉波問題的相關報導受到壓抑。這樣的壓抑並不只是存在於各大媒體，也存在於領導戰後日本革新派言論的綜合性期刊《世界》之中。⁵然而與其說這種壓抑是來自於對外關係的顧慮，毋寧說這種壓抑帶有意識型態上的意義，而不可加以忽視。這種壓抑或忽視，與被視為是日本戰後革新派的中國研究學者對於劉曉波問題的反感的沈默深相關連。是故劉曉波問題，

4 我在2010年1月23日早稻田舉辦的「緊急集會·思考天安門事件與08憲章」中的發言。我在此集會中的發言〈對我們而言，中國民主化究竟為何〉，刊載於《環》41期小特集集中的「思考天安門事件與08憲章」。（東京：藤原書店，2011）

5 在撰寫本文時（2010年11月），我得知了刊行雜誌《世界》的日本權威出版社岩波書店，得到了《劉曉波文集》在日本的獨家發行權。從不聞問劉曉波問題的岩波書店取得此發行權，當時我認為這是商業主義的墮落行爲。但在今年二月，我在得到以《最後の審判を生き延びて》為標題出版的岩波版《劉曉波文集》之後，我了解了岩波書店的發行意圖。在岩波版的《劉曉波文集》中，收錄了批判劉曉波與「08憲章」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一事的丸川哲史、鈴木將久的「解說」。岩波書店是帶著惡劣的政治意圖發行此書，把附帶了批判劉曉波及其獲得諾貝爾獎一事的書呈現給讀者。岩波書店以及中國政府的代言人丸川、鈴木等，對於支持身處獄中的劉曉波的人，以及期待中國民主化得以進展的人而言，不啻是潑了一盆冷水。並且，本書的標題《最後の審判に生き延びて》，是中文「末日倖存者」的日文翻譯，這是不明確、會讓人產生誤解的標題。僅依此一標題即可知岩波書局的曖昧的出版意圖。

也對日本的中國研究者在現代中國的認識上，提出了批判性的檢討的問題。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口氣吹散了大眾傳媒的這種壓抑。的確，諾貝爾和平獎獲獎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否定、批判這次的得獎，並且對以劉曉波家族為主的關係人加以拘留、隔離，這不只是中國政府對國民隱瞞這次得獎的事實，並且還對外施加壓力，企圖湮滅此一問題；中國政府的異常，也完全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於是，這就使得人們開始思考，存在於這樣異常的中國政府的反應背後，中國這個國家及其社會的實際情形究竟為何。確實，一部分的新聞媒體開始報導中國社會內部所產生的變動。然而，必須要注意的是，正如許多有識者所言，諾貝爾獲獎會不會使得當下的中國政府更加強化國內的言論控制，在這個問題上，會不會使其加強對外壓力？如此，對於中國的壓力極端敏感的日本而言，劉曉波和「08憲章」被遺忘在某個角落，或許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在劉曉波和「08憲章」的報導受到壓抑的時期，日本出版了《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一書。那麼，如上所述，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後的現在，這對於爲了劉曉波，而於2009年12月出版這本書的我們來說，所提出的課題又是什麼？這即是，將劉曉波當作是**我們自身的問題**。所謂我們自身的問題，並非如當下的大眾傳媒把它當作一時流行性的話題，或是出於商業主義的出版企畫，而是把它當作是**我們民間的自立性的市民的問題**。未來的希望在民間，這難道不是劉曉波對我們所發出的重大訊息嗎？這說的不只是中國未來的希望而已，也是日本未來的希望所在。

二、「文革」，或是高行健與劉曉波

在劉曉波2010年10月8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前，國際作家協會東京大會從9月26日開始召開。在2009年末，北京人民法院宣判劉曉波11年的有期徒刑之時，在日本，最早提出要求「立即釋放聲明」的正是日本作家協會。我在早稻田的集會曾說過此一聲明乃是「對於

就此問題幾乎沒有任何反應的日本輿論界而言，此一抗議可以說是極為珍貴的。然而這份抗議聲明是否出自於國際作家協會的要求？抑或是出自於日本作家協會自發性的舉動，我就不得而知了。」果然，日本作家協會的聲明並不是出於自發性的舉動。日本作家協會拒絕將以劉曉波作為議題的集會納入東京大會的議程。結果，「劉曉波所為何事——思考中國獄中作家之夜」的集會（由獨立中文作家協會、日本國際人權救援機構協同主辦），在國際作家協會東京大會正式召開的前晚，被排除在議程之外，在早稻田奉仕園舉辦。這個集會有18個國家的作家參加，但是沒有一個日本的作家出席。但是我在此陳述國際作家協會東京大會的相關事情，並無意嘆息日本作家的政治癡呆，而是旨在說明我因此接觸了身為東京大會的演講人而來到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作家高行健。

對於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高行健，我並沒有過太多的關切。對他的了解也僅止於新聞上報導他獲獎的消息而已。直到10月7日的《朝日新聞》上刊載的大篇幅採訪報導之後，我才重新認識到他的存在。在那篇報導中，介紹了身為「自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國民主化運動遭受武力鎮壓歷21年，今雖遠離故國，在世界各地踏上流亡之途」的作家、藝術家的其中一位——高行健。然而在如此接近劉曉波獲獎的這個時候，能夠認識高行健，我感到這與其說是機緣，不如說是某種命運的必然性。我在劉曉波得獎之後，立刻拜讀了高行健以「文革」體驗為背景的自傳性小說《一個人的聖經》⁶。那是一本沉重的小說。所謂流亡就是歷經「文革」而殘存至今的他的身影。高行健在訪談中也說：「我的單位裡也有十幾個人跳樓自殺」。

你們所追求的正義，就是那個男人本身。你們爲了那男人互相殘殺，被迫高喊那男人的口號。……你們被改造，拭去記憶，喪失頭腦，成爲那男人的信徒。信奉無可置信的事，成爲那男人的手下、那男人的走狗。成爲那男人的犧牲，利用完畢後就被盛放在那男人的祭壇，作爲那男人的陪葬品而被燒卻。（《一個人的聖經》第二十章）

這就是「文革」。然而高行健所描寫的這種具備神聖權力、恐

怖與群眾動員等全體主義政治運動特性的動亂經驗，在我們自己諸多的歷史體驗中，難道就沒有過嗎？那是和天皇制的全體主義、和史達林主義式的全體主義一樣的東西不是嗎？我一邊讀著《一個人的聖經》，一邊覺得「文革」乃是20世紀全體主義最後的、也是最淒慘的表現。將「文革」視為全體主義的政治動亂，它一方面帶有中國的特殊性，同時在20世紀現代史之中，作為全體主義的動亂，是否也可以站在各個個別的全體主義的歷史經驗之上，來看待「文革」呢？「文革」正是要求全體主義中國進行徹底的政治改革，亦即民主化的民族悲慘歷史體驗。

1940年出生的高行健，在他二十多歲時的人生歷程中，體驗了196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而1955年出生的劉曉波，則是在十多歲的時候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他曾經在文革時擔任過小紅衛兵而活躍一時⁷。然而，因著是在二十多歲時體驗文革，或是在十多歲時經歷文革的不同，「文革」在他們心中所留下的意義也完全不同。對高行健而言，「文革」乃是埋葬自我記憶、捨去自我頭腦，才得以勉強保住一命，這就是身為流亡作家的現下的高行健。然而對當時十多歲的劉曉波而言，「文革」或許只是在他們眼前展開的——高行健等知識人或知識青年們的欺騙、迎合與逃亡——悲慘轉向劇。

三、中國知識人批判

「文革」後劉曉波的批判，轉向容許暴政的中國社會裡的「弱者」——知識人。所謂「弱者」，就是屈服於權力者，成為容許專制存在的土壤，為了支配他人而接受懷柔籠絡，而被當作是手足一般使用的奴隸。劉曉波雖然認為中國的民衆是弱者，但那並不是說他們是生活上的弱者。而是指他們身上有著對於權力的抵抗力與抵抗意志都

7 劉曉波云：「文革開始時，我11歲，除了我力不能及的活動以外，幾乎所有能參加的活動我都盡全力參與。」引自〈唯我獨尊式的自我美化〉，《現代中國知識人批判》，野澤俊敬譯（東京：德間書店，1992）。

付之闕如的奴隸根性，所以才稱之為弱者。魯迅對於奴隸性的中國人民曾說過：「對其不幸感到悲哀，對其不爭則感到憤怒。」⁸劉曉波對於現代中國的民衆，與其說是「感到悲哀」，不如說是「感到憤怒」要來得更為強烈吧。⁹他曾經這樣講過：「軟弱而愚昧的中國人民」。支配「文革」後的劉曉波的語言是尼采的強者—弱者的語言。然而這強者—弱者的語言，也是針對中國專制支配的歷史全體的憤怒的語言。劉曉波說：「特別是在中國，因為弱者衆多，遂成為專制主義予取予求的絕佳土壤。正是由於人們過於軟弱，才使得專制、暴政得以壯大。軟弱是導致中國專制主義如此放縱專橫的重要原因之一」。

受到毛澤東煽動的群眾造反的「文革」，系譜性地追溯了知識人的由來並對其加以否定¹⁰。劉曉波如此定式化毛澤東的人民主義革命的意識型態：「以無知為榮譽、以無知為革命的前提條件，如若以擁有知識為無恥，而視為反革命的前提條件，必然會煽動不知法律與道德為何物的無知群眾的造反熱情，必然會煽動他們對於人類的知識與文化的瘋狂仇恨」。確實，「文革」也正因如此而得以遂行。身處於專制權威與受其煽動的造反群眾之間的知識人，於是進行自我否定、自我毀滅。當被稱為十年內亂的「文革」結束時，自我毀滅的知識人卻以受難者的身分恢復其原有地位。然而這些復權的知識人，對曾經屈服、迎合、逃脫於專制權力的自己，又作如何感想呢？

他們對於中國知識人與專制主義制度的關係，未曾有過嚴肅的考察。更何況要他們承認自己的軟弱、愚昧與盲目服從權力的奴隸人格。與此相反，他們一方面陳訴自己的痛苦，一方面歌頌偉大救星，同時也美化了自己。

這是相當嚴厲的指責。何處嚴厲呢？劉曉波對於知識人的批判，乃是對於中國長遠歷史文化中，迎合專制權力的軟弱知識人的歷史批判：

8 劉曉波所引魯迅初期文藝評論《摩羅詩力說》上的話。

9 見前註7，〈唯我獨尊式的自我美化〉，《現代中國知識人批判》第五章。

10 文革時，紅衛兵襲擊共產黨的學校、職場、地區各機關，收奪於各處保管，紀錄個人政治、思想經歷文件的檔案袋。並由此追溯每人的家人、學校、交友情形並加以糾彈。

這幾千年來重視「以柔克剛」、「無為而治」的文化傳統的中國，到處都充滿著弱者。正是這種「柔弱似水」的文化，形塑了壓抑強者、迎合弱者的中國知識人的人格。

幾千年來，將中國獨裁者神格化的全都是知識人的把戲。而無知的一般庶民不過是受到輿論左右，而服從於文化人所創造出的神格化的獨裁者而已。

劉曉波絕不容許在「文革」結束後，知識人以受難者身分而復權。到毛澤東為止的全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支配者，都是迎合的、軟弱的中國知識人的創造物，這是他作為知識人的自我批判。這裡面有著中國知識人首次的徹底自我批判。¹¹

劉曉波在1989年民主化運動正要大肆開展之時，要求自己，同時也要求別人，做一個勇於批判的自主性知識人。「只要用自己的知識與社會全體對話，並且以自己的知識領導社會進步，糾彈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特別是政治上的不正，以此來守護社會正義。」這就是知識人。這種立志要做擁有自主性的知識人，勢必與強迫的奴隸屈從式的專制政體相對立。緣此，自主性的知識人為求民主政體之實現，便不得不進行鬥爭¹²。

1989年4月下旬，劉曉波為了加入天安門廣場眾多學生們的戰鬥行列，從紐約回到中國。此時的他，應該是把此處當作是驗證自主性知識人的戰場吧。然而，他的這個決定也成為中國知識人在歷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意義，這裡面瀰漫著一種知識人為自身而戰的獨善的味道¹³。這也是尼采式的高貴的強者所賦有的獨善性吧。他的言論的力量此時尚未能到達人們靈魂的深處。然而隨之發生的天安門事件的悲

11 關於劉曉波對中國的專制權力與迎合的知識人的批判，石井知章已有言及。請參見：〈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と中國問題〉（魏特夫格與中國問題），《K.A. ウイットフォーゲルの東洋の社會論》（魏特夫格的東洋社會論）第五章（東京：社會評論社，2008）。

12 「因此，知識人爭取自己的獨立權的鬥爭也是一種政治的動作。通過這種政治鬥爭，知識人才得以擺脫屈從於政治的奴隸地位。因此，爭取知識的獨立權的鬥爭，正是打倒專制體制、建立民主政體的鬥爭。」引自〈知識人的無產階級化：現代愚民主義〉，《現代中國知識人批判》第六章。

13 在此意義下，《現代中國知識人批判》一書的再版，作者劉曉波未必會高興吧。這本書若沒有輔以適切的說明，可能反倒會成為批判劉曉波的材料。

劇和挫折，卻重新改造了劉曉波的言論。

四、天安門事件的真相

1989年6月4日拂曉，劉曉波等人拼命說服學生們迴避即將迫近天安門的悲慘事實。撤退，對於權力當局的**武力鎮壓**，更加證明學生、市民們對**和平的民主**的要求的正確性。學生們被說服了，在夜將破曉的5時許，從廣場撤退下來。戒嚴部隊在前晚11時許開始武力鎮壓，為數眾多的士兵和卡車從東西兩方開始向天安門進軍，士兵們全副武裝。士兵們對著企圖阻擋去路，堵住長安街的市民與學生開火，人民解放軍朝人民開槍這一衝擊性的武力鎮壓開始。在戒嚴部隊以武力包圍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造成了學生、市民的許多傷亡。在戒嚴部隊以武力進行包圍的同時，與迫近的殺戮爭奪時間的劉曉波等人，正進行著說服學生的工作。於是，決定撤退的學生們列隊退出廣場。當時正好在廣場的日本記者說：「與廣場外的悲劇相比，廣場上，至少紀念碑周圍，並沒有發生流血事件。」

我現在根據《朝日新聞》的永持記者所修正的事件當時的報導〈重現天安門事件〉¹⁴一文，來說明6月4日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事件的經過。永持記者是當時正好人在天安門廣場現場的極少數的記者中的一位。他證實「廣場上，至少紀念碑周圍，並沒有發生流血事件。」此一證言在二十餘年後的現在，為何會和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報導一起被刊登在*AERA*上面，其中緣由我也不甚明白。但是既然得知此一證言，我在上述的《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的序文中，依據《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三份報紙報

14 〈天安門事件を再現する〉，*AERA*(47)(2010/10/25)。作者是朝日新聞社的永持裕紀記者，永持記者在6月4日當時，是身在天安門廣場的2、3位記者中的其中一位。在天安門事件被中國當局隱瞞，鎮壓的真相被隱伏在黑暗之中的現在，永持記者的證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這篇文章在二十餘年後的現在不是刊登在其母報《朝日新聞》，而是被刊登在*AERA*之上，也是出於相同的政治理由吧。

導所寫的關於天安門廣場屠殺的文章¹⁵，就跟最初所報導的事件的經過一樣，不得不加以修正。於是根據此一修正，我也必須重新確認一直背負著事件犧牲者亡靈的劉曉波的行為的沉重意義。

爲了要思考天安門屠殺事件的問題，我們必須重新閱讀劉曉波的文章。他曾經反駁過香港親中的共產黨系政黨，民建聯的主席馬力的發言。馬力認爲當時從廣場撤退是可能做到的，戒嚴部隊的鎮壓並不是故意「屠殺都市居民」。對此，劉氏如此反駁：

六四之夜，仍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四千名學生的生命，是自發性的撤退換來的。爲何如此？出面與我方交涉的廣場鎮壓指揮官季星國上校非常明確的說：「戒嚴部隊接到的命令是絕對的，在破曉之前，不惜一切代價施以鎮壓。如果，學生們不願自動撤退的話，結果必將造成學生們大量死亡於鎮壓部隊的槍口與戰車的履帶之下。」（〈市民屠殺〉，《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

這很明確地表達出戒嚴部隊將毫不猶豫執行屠殺的決心。學生們從廣場撤退，這並不能打消戒嚴部隊進行武力壓制的決心。事實上，在包圍天安門廣場的過程中，戒嚴部隊即向學生、市民行使武力。劉曉波也舉出，爲了要追擊學生，在西單附近有戰車突入學生的隊伍中，來不及走避的學生被軋死於戰車的履帶之下。戒嚴部隊的確屠殺了學生和市民。學生們從廣場上撤退，絕對不能被用來否定戒嚴部隊殘殺人民的事實。

天安門屠殺事件的真相被當局封鎖。然而，想要知道屠殺真相的難道會是被屠殺者那一方嗎？當然，想要知道真相的是被屠殺的一方。而屠殺的一方卻隱蔽、或否定這一事實，被屠殺的一方則是已經無法出言指證，屠殺者甚至把犧牲者的遺體一併抹消掉。然而又有誰能究明真相呢？能究明真相的，就是被屠殺者的母親們，也就是「天安門的母親」。她們在充滿困難、人身危險的情況下，收集了「六四」受難者的名冊與證詞。2003年，受難者家族團體向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

15 我的這篇序文是根據《朝日新聞》、《讀賣新聞》、《每日新聞》等三份報紙關於6月4日拂曉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事情的報導。因爲新聞受到管制、新聞相關人員被驅離，這次的武力鎮壓事件的真相，基本上只有鎮壓者才會知道。因此這三份報紙的報導也是根據傳聞。

大會的代表們提出了公開信¹⁶。上面這樣寫著：

截止2003年2月，我們已尋找到慘案的死難者182位，傷殘者71位。在漫長的尋訪活動中，我們發現有相當數量的失蹤者。他們都是在89年6月3日及以後的幾天裡突然消失的。他們活不見人，死不見屍，至今下落不明。他們的親屬在過去的歲月裡曾多方尋找，但毫無結果。目前，我們已記錄下了12位這類失蹤者的名字，而據我們多年來的調查、瞭解，實際的失蹤者數字要遠遠多於記錄下來的數字，比如當年曾被倉促地掩埋於天安門附近的一些遇難者屍體至今沒有下落。（〈天安門的母親〉，《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

對於隱瞞殺戮事實，企圖把這件事從歷史上抹消的當局，「天安門的母親」堅強地要以「符合文明的方法」來究明真相，並要求在法治之下，追究執行殺戮者的責任。「符合文明的方法」，是劉曉波的語言，相對於野蠻地行使武力屠殺，這些母親們的告發，理性、和平地訴求真相的究明與法定手續的公正裁判。天安門事件的真相，可以說就在他們背負死者亡靈的勇氣與持續不斷的抗爭運動之中。

劉曉波在事件兩天後的6月6日被逮捕，被關在北京郊外的秦城監獄，於1991年1月被釋放。他和那些母親們一樣，帶著在身為背負天安門事件死者亡靈的倖存者的痛苦之中的決心出獄。¹⁷

五、背負死者亡靈

從秦城監獄出獄，劉曉波認為自己是倖存者。所謂倖存者是指和死者們共同經歷事件，而僥倖得逃一死。得以倖存不死這件事，讓他感到內疚。更有甚者，劉曉波在獄中是以背叛自己的形式獲釋而得以

16 天安門事件受難者家屬團體「就六四問題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公開信」，自1995年起，每年持續發表。

17 劉曉波寫下「悔過書」後出獄。關於此，劉燕子女士如此解說：「劉曉波不使巧妙之詭辯、直視自己的利己心、痛徹地反省、責問自己的軟弱、怯懦與卑屈。並決心效仿魯迅『徹底直視慘澹的人生、徹底正視淋漓之鮮血』的面對現實的真勇士。」引自〈編者解說〉，《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

倖存。他對死者感到雙重的內疚而苟活下來。劉曉波這樣說倖存的自己：

1989年6月4日以來，我這僥倖的倖存者，經常對自己響以警鐘。「六四」的無辜死者的靈魂一直從天上看著我，「六四」的受難者家屬則在地上不斷的啜泣。我卻在秦城監獄違逆本心而悔過，守不住一直堅守著的作為人的最低一線。在我寫悔過書的時候，我是在踐踏著自己的良心。我也知道了我的孤獨、脆弱與自愛，也認識了我內在的利己的處世之道與虛偽的生存策略。那種恐怖與苦惱遠遠超過監獄所給我的恐怖與孤獨。帶有界限與弱點的人類，必須知道敬畏與謙虛。只有自己對自己的靈魂施以拷問，才能得到救贖，釋放也必須由此獲得。面對鐵窗的試煉，不及將自己的靈魂置於荒野的試煉。¹⁸

劉曉波將「六四」的記憶之針，刺入體內而倖存下來。每到「六四」之時，他就將「六四」的記憶之針刺入自己的心臟，讓它沾滿鮮血，他也把這段記憶刻寫成詩。2004年6月4日他這樣寫道：「15年過去了，那個被刺刀染紅的血腥拂曉，不變地，如針一般地刺入我的眼中。自那以來，映入我眼簾的東西都帶著血污。我所寫的一字一句，都來自於墳中靈魂的吐露。」¹⁹如果「六四」的忘卻，是將屠殺者的政權與自己的未來一起埋葬在黑暗裡的話；那麼「六四」的記憶，應該就是與死者一起開拓未來的戰鬥吧。劉曉波云：「在絕望之中，賦予我的唯一希望，就是將靈魂刻寫入記憶裡。」

帶著死者的記憶，背負死者的亡靈，這是倖存者的戰鬥。倖存者本來就是在暴政與暴力之下應死而僥倖未死的人。如果連倖存下來的人都沒有背負那些死者的亡靈的話，那麼這些冤魂只會被埋葬在歷史的遺忘土壤之中吧，而倖存者的傲慢就會在他們被埋葬的土壤上，開出悖德之花。劉曉波背負著「六四」死者的亡靈而殘活下來。他把「六四」死者的記憶，也就是在他體內有如針刺般的記憶，刻寫在詩

18 這裡引自《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一書劉燕子的〈編者解說〉中劉曉波自我批判的話。劉曉波的話是引自高瑜的〈公民劉曉波〉，《零八憲章與中國變革》，中國信息中心編輯（北京：勞改基金會，2009）。

19 〈對於忘卻的記憶鬥爭（迎向第十五周年）〉，《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

裡。那也是刻寫在從20世紀戰爭與暴力的時代殘留下來的我們的心裡的記憶。讓我們看一下他的詩〈六四，一座墳墓〉，那裏面有著必須銘刻在我們心中的記憶：

在遺忘和恐怖之下
這個日子被埋葬
在記憶和勇氣之中
這個日子永遠活著

六、天安門的母親

究明天安門事件真相的，就如我上述，是「天安門的母親」。關於這些「天安門的母親」的六四事件受難者家屬團體，劉曉波這樣告訴我們：

這個由失去兒女的孤獨老人、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母的孤兒、失去謀生能力的傷殘者所組成的受難者團體，從最初的生不如死到漸漸走出絕望的憂鬱。儘管生活的艱苦一言難盡，靈魂的煉獄難以表達，在高壓之下只有沈默，覺醒後的抗爭又是那麼險象環生，但受難者家屬之間的相互取暖和國內外良知者的同情支持，近乎奇蹟般地使得「天安門母親」得以毅然挺立。（〈天安門的母親〉，《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

在企圖把這個事件從公共歷史抹殺的中共政權之下，力圖究明事件的屠殺真相，追訴其法律責任的「天安門的母親」的存在及其持續不斷的活動，本身就是一個奇蹟。原本在共黨政權下難以進行的活動，她們竟能持續的堅持下去。劉曉波深知，這個可說是奇蹟般的韌性極強的活動，乃是中國走向未來的重大一步。1995年，「六四」事件受難者家屬團體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了第一封公開信。信中提出三項要求。第一，設置事件調查委員會，公正調查事件真相。第二，將包含死者的名冊、人數的調查結果公開於全國人民之前。第三，依據法定程序，究明事件責任歸屬，並逐一向死者家屬說明個別事例。為求「六四」事件真相，受難者家屬團體每年都向全人代提出究責公開質問信。在這期間，他們自己一步步去探訪犧牲者

的親屬，所以每年公開信中的署名人數不斷地增加。1999年，正值事件十周年之際，他們組成了受難者親屬對話團體，向共產黨的領導人尋求理性解決的對話。並於2000年發表了「六四對話團就六四問題之解決致國家領導人書信」的公開信，並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了自1997年起即一直提出的李鵬控訴狀。

這裡面有著在中國現代史上未曾出現過的，出自人民的、基於人民權利的運動的展開。自中國共產黨掌握政權以來，在一黨專制及獨裁的領導者的錯誤之下，不斷重複的黨內權力鬥爭與政治、政策失敗的結果，造成人民大規模的災難，並使得大量的人民成為犧牲。反右派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造成高達數千萬人民的犧牲。即使曾經被犧牲、受迫害的政治領導者們，在政變之後得以恢復其名譽，而無數死亡的人民卻被棄置於歷史的過程之中，白白犧牲。然而，「天安門的母親」卻在中國現代史上首次要求逐一究明其家屬慘遭屠殺的真相，及透過法定程序追究相關責任。而且，這是背負犧牲者亡靈的母親、妻子們，作為一個人民的權利所提出的要求。

我在陳述劉曉波所寫的「天安門的母親」的理性的、堅韌的抗爭過程的同時，深深受到感動。同時我也認識到，集約表現在「08憲章」的對於民主化的要求與運動，正濫觴於此；或者是，將奠基於此。劉曉波云：「糾正中國共產黨的過失、追究其罪責、將公正還之於民的民間運動，無疑地，是『六四』遺族團體最偉大的功績。」²⁰ 劉曉波的脚步，與天安門的母親、妻子們一起，背負「六四」的死者亡靈，筆直地走向「08憲章」。

七、公民的主張

天安門的母親，作為一個人民，向政府提出究明「六四」事件的真相並追究相關責任的要求。此時，這一個人民正是一位公民。然而

20 劉曉波，〈民間組織都是「非法組織」嗎？：關於結社自由〉，《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

「公民」究竟為何？

依中日辭典，「公民」，「乃是擁有公民權的人民」，並舉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一例。（愛知大學中日大辭典編纂處，《中日大辭典》，大修館書店）。若依據日本的國語辭典，現代用語中的「公民」，其對應語乃是英語中的citizen（市民）一語，意指「擁有參與國家政治的權利的國民」。（《大辭林》，三省堂）。這個字典上的公民的意義，是具暗示性的。這承認了現代中國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公民權，也說明了迄今未曾有過參與國家政治權利的公民之事實。同時，這也說明了，天安門的母親們所踏出的一步，在現代中國是多麼重大的一步。她們以韌性堅強的活動，第一次展示了自己身為公民，乃是擁有對政府發言的權利的一個人民。

我之所以注意「公民」一詞，是因為重讀「08憲章」，認識到這是**中國人民的公民主張**。「08憲章」的第三章「我們的基本主張」的前言這麼說：

我們本著負責任與建設性的公民精神，對國家政治、公民權利與社會發展諸方面，提出如下具體主張。²¹

這裡的「公民精神」、「公民權利」，正如他處的日文譯為「市民精神」、「市民權利」一樣，這個「公民」就如國語字典上說明的，是「市民」(citizen)的意思。這種譯法對我們來說比較容易理解。然而，要把這種被上位者所給予的、只有虛名的公民，改變為擁有對上位者發言的權利的人民，亦即改變為真正的公民的「08憲章」，使用「公民精神」、「公民權利」等語彙，乃是相當重要的。若能如此理解，那麼也就能理解「08憲章」與支持劉曉波的《08憲章與中國的變革》一書，會刊載高瑜以「公民劉曉波」為題的文章的意義。劉曉波認識到天安門的母親們的活動，正是自覺身為公民，而打開中國人民的未來的活動，於是自己也決心、宣言作為一個公民。他現在作為一位公民，也是「08憲章」的起草者與推行者。「08憲章」

21 譯文是根據《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中所收及川淳子所譯的「08憲章」。

第二章的末尾，有如下的言論：

所謂公民，應是真正的國家主人。拋開對「明君」、「清官」臣民意識的依賴，發揮以權利為基本、以參與為責任的公民意識，去實踐自由、行使民主、尊重法治，這才是中國的根本活路。

這是說中國的民主化，在於使中國人民能夠真正地成為公民。於是，讀此文章，可以清楚地發現，曾經以激烈言論否定在獨裁專制的長遠的中國歷史中，迎合權力、阿諛奉承的包含知識人在內的中國弱者的劉曉波，通過天安門事件，轉變為認識到從親身體現公民含意的「天安門的母親」所代表的民間活動，才能看到中國未來的活路的劉曉波。然而與其說是轉變，毋寧說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帶著雙重愧疚而殘存的劉曉波，在此**獲得重生**。

我在此處所作的重讀《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的作業，正是發現到通過天安門事件而獲得重生的劉曉波，亦即「公民劉曉波」的作業。現在他正身陷獄中，這也正是貫徹他「公民劉曉波」的要求與抗爭。最後我在此再加上三點附言。

八、三點附言

第一點，劉曉波等人所從事的民主化運動，乃是真正的「公民權運動」。正如方才所引「08憲章」之主張：「所謂公民，應是真正的國家主人。」而日本的大眾傳媒，卻將「08憲章」當作是反對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國家體制的民主化要求，而概括性的報導。我們一直以來也是如此地理解。確實，「08憲章」主張「廢止一黨獨占的執政特權」。但是那是歸屬於關於「結社自由」的保障公民結社自由之一條項。將「08憲章」做如此的概括與理解，這和中國以民間活動型態而持續進行中的民主運動的實況相去甚遠不是嗎？「08憲章」，是根據基於中國人民的公民意識的積極民間活動，企圖為現代中國開闢出根本的活路。這和天安門的母親、妻子們所進行的活動，都是基於同樣的**理性的活動**。中國的變革必須要是和平而理性的，這是深深刻在見證過無數殉難者的中國改革運動者心中的鐵則。緣此，將「08憲章」

與其理性的推動者視為顛覆國家的煽動者，中國當局非理性的暴力就更加顯眼。將民主化運動當作是反國家的犯罪，這是自己封閉中國未來的活路。我並非反中國主義者，而是從中國思想獲益良多的思想家，我喜歡中國。所以我說把劉曉波監禁在獄中是大錯特錯。

第二點，在中國，要求公民權的民間活動，在都市、農村，及許多工廠，已經大量的發生。劉曉波在《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中也表示²²，這可見之於農民、勞工等自主性的組織、在四川大地震之際所發起的自發性的救援活動，以及網際網路上的自發性民意的集結等等。並且，麻生晴一郎也詳細地陳述²³，從文化圈的活動到地區性的住民活動等各式各樣的由市民、居民所發動的自主的、自發性的活動，正一步一步的改變現代中國社會。正如麻生氏所言，僅僅追蹤中國的政府與共產黨的動向，幾乎是不可能了解中國社會的。民間活動現正實質地一點一點的改變著中國社會，「08憲章」與民主化運動絕非孤立、游離之物。應該可以把它看作是，看準了由於民間的組織與活動，將使得中國社會出現變動的未來，而預先作的自覺性的改革吧。

第三點，中國的這種「公民權運動」或民主化運動，應該把它視為21世紀的後近代全球化時代的運動。中國的民主改革，其意義並不止於是一國的變革。中國在諾貝爾和平獎授獎這種國際的批判性訴求之下，之所以能紋風不動地繼續監禁劉曉波，這是因為以日本為首的各國，不願看到和經濟大國中國之間的關係發生動搖。這是互相欺瞞的國家關係。這是隱忍自保的虛偽的國家關係。這也就是他們所稱的戰略性互惠關係。

「六四」事件的受難者家屬的公開訴求如下：

爲了讓「六四」這樣的屠殺事件不再發生，我們主張，公正合理的解決「六四」問題、消除人與人之間的敵意與仇

22 劉曉波的著作《未來的自由中國在民間》中已有陳述，由《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第三章所刊載的四篇文章也可獲知。

23 麻生晴一郎，《反日、暴動、泡沫——新聞、電視所不報導的中國》（東京：光文社，2009）。

恨、達成朝野間乃至於全民族間的和解。依此，來加速中國在和平中轉變的歷史過程。²⁴

天安門事件的根本的解決，只能憑藉中國的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化，也必須在和平的轉變中，達成政府與人民間、民族與民族間的和解。中國的民主化就是在中國實現和平，和平穩定的中國乃是東亞和平最重大的基礎。這一點應該是誰都能同意的吧。若如此，我們應該知道爲了中國的和平，甚至是東亞的和平，劉曉波不應該被監禁在獄中。我們之所以要求立刻釋放劉曉波，並非出於虛偽的中日關係，而正是要建立一個真實的中日關係。這對於改革我們自己虛有其表的民主應該也有所助益吧。

24 「六四」事件殉難者家屬團體的18周年公開訴求。引自劉曉波〈轉型期的正義：改革無須暴力革命〉，《從天安門事件到「08憲章」》。